



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学术出版资助项目

社 科 学 术 文 库

LIBRARY OF
ACADEMIC WORKS OF
SOCIAL SCIENCES

外国历史大事集

近代部分·第一分册

朱庭光 ● 主 编

张椿年 ● 副主编

唐 枢 张宏儒 孙 娴 ● 分册主编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科 学 术 文 库

LIBRARY OF
ACADEMIC WORKS OF
SOCIAL SCIENCES

外国历史大事集

近代部分·第一分册

朱庭光 ● 主 编

张椿年 ● 副主编

唐 枢 张宏儒 孙 娴 ● 分册主编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外国历史大事集. 近代部分. 第一分册 / 朱庭光主编.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7. 3

(社科学术文库)

ISBN 978 - 7 - 5161 - 9655 - 7

I. ①外… II. ①朱… III. ①世界史—近代史 IV. ①K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005368 号

出 版 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刘志兵
特约编辑 张翠萍等
责任校对 王佳玉
责任印制 李寡寡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发 行 部 010 - 8408368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刷装订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7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36.5
插 页 2
字 数 618 千字
定 价 158.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 010 - 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再版说明

《外国历史大事集》出版于20世纪80年代，是当时我国世界史学界知名学者们多年辛苦劳动的集体成果，体现出了扎实的学术功底和应用价值，是重要的学术参考书。二三十年过去了，此书仍然受到我国世界史学界的重视和广大读者的欢迎。

《外国历史大事集》此次再版，受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的大力支持，将其列入社科学术文库。根据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的建议，此次再版时，将版式改为小16开；消除了原著中的一些错别字，对表述不够准确的地方也进行了推敲审定；删除了不清晰的插图，增加了古代部分的大事记内容。再版工作受到世界历史研究所专家们，包括一些退休专家的大力支持，他们对原著进行了细心审读，付出了辛苦劳动。参加审读的专家有如下同志：古代部分：第一分册，刘健；第二分册，郭方。近代部分：第一分册，于沛；第二分册，汤重南；第三分册，于沛；第四分册，部彦秀。现代部分：第一分册，沈永兴；第二分册，王章辉；第三分册，于沛；第四分册，姜芃。世界历史研究所科研处的同志也为再版修订做了大量工作。

衷心感谢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的支持！感谢参加修订工作的各位同志的辛勤劳动！对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决定再版《外国历史大事集》和出版社有关人员的辛苦劳动表示衷心感谢！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

2016年11月

初版说明

《外国历史大事集·近代部分·第一分册》共辑入世界近代史上有一定历史地位和国际影响的重大历史事件记述 49 篇，起自 17 世纪中叶英国资产阶级革命，迄于 19 世纪 40 年代科学社会主义诞生和共产主义者同盟成立之前。按事件发生的年代先后，以欧洲、美洲、亚洲、非洲、大洋洲的顺序依次编排。

本册编辑小组由唐枢、张宏儒、孙娴、梅伟强、汤重南、李显荣、于沛七位同志组成，唐枢、张宏儒、孙娴任主编。组织和处理编件的分工是：西欧、北美、大洋洲方面，由唐枢、张宏儒、孙娴负责；苏联、东欧方面，由李显荣、于沛负责；亚洲、非洲、拉丁美洲方面，由梅伟强、汤重南负责。张小雪参加了选定插图的编辑工作。朱庭光、张椿年通读了所有稿件，由朱庭光定稿。地图绘制张路红，封面设计姜樑。

1984 年 9 月

前 言

《外国历史大事集》是一部兼有工具书性质的世界史基础读物，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组稿编辑。全书编为10册，其中古代部分2册、近代部分4册、现代部分4册。从1982年下半年起，各编辑组陆续开始组织、退改稿件。现在，近代部分第一分册业已定稿，预期将按每隔三四个月发稿1册的安排，力争在1986年内把全部稿件编辑完毕，交付重庆出版社陆续出版。

本书作为《外国历史名人传》的姊妹篇，从阐述、剖析和评价历史事件的角度，考察和反映世界历史的演变。也可以说，它是一套集纳记述世界历史上占有一定地位的各国重大历史事件的系列化的文集汇编。以单篇而论，大事集稿件的容量约比名人传增加1倍，平均每篇1万字，有一部分稿件达到1.2万字，甚至更多一些。而且，对于在世界历史发展过程中具有重大影响的事件，采取了分解课题的办法，使之能有足够的篇幅阐明所应涉及的内容。例如近代部分第一分册中的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法国大革命和拉丁美洲独立运动，就是分成几个选题，按其发展阶段，或者划分不同地区，各自独立成篇予以阐述的。

对本书稿件的基本要求，是要应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科学地说明发生各个事件的历史环境，事件的起因、渊源和演变，在事件中起过重大作用的个人、组织或流派所持的政治主张、思想观点和所作的突出贡献，事件的结局和影响，以及对事件的评价。特别要求作者掌握历史科学的具体性这一根本特点，尽可能充分地用事实、数字、史料和文献说话，同时又抓住要点，言简意赅地概述和分析事件发展的历史过程。

这部《外国历史大事集》，现已列入第六个五年计划期间全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规划，作为世界史学科的国家重点项目之一。不言而喻，这意味着国家对于发展世界史学科的支持和鼓励，同时也要求它理应具有较高的质

量,达到与国家项目相称的学术水平。在我国世界史研究基础非常薄弱的条件下,要真正做到这一点,将是一项极为艰巨的任务。

我认为有必要预先说明,列为国家科研项目,由国家研究机构从事组稿编辑,并不表示这部大事集稿件中所作的叙述和评价具有代表党和国家发言的性质。它不等同于政府文件的权威性,而是属于学术领域,是我国世界史研究和教学人员对各个历史课题所作的探索和回答,要体现百家争鸣的方针。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我们希望做到,稿件中叙述事实和作出评价时,对那些近年来国内外学术界有过争论的问题,在主要表述作者观点之外,适当介绍堪称一家之言的不同见解;而当编者与作者之间产生某些不同看法时,如果交换意见后作者仍然坚持,可以保留作者的观点,编者只负统一体例、文字加工之责。

我们世界历史研究所为什么要用四年多时间组织这样一个既费时又费力的项目呢?

第一,期望能在推动世界史研究为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服务方面,作点微薄的努力。

历史与现实是紧密连接而不能截然割裂的。这不仅在于今天所说的历史原本是昨天的现实,更重要的是,因为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工作者来说,认识世界的目的就在于改造世界,研究历史正是为了推进现实,面向未来。历史科学本身虽然并不负担直接回答现实生活中各种各样问题的使命,但是,只要方向明确,课题选择得当,的确浇注了心血,它仍然可以对推动现实起到多方面的作用。

我们的历史研究是要科学地描述人类的昨天,再现人类社会向前奋进的历程,褒贬人物,评说事件,歌颂人类创造的一切美好的事物,鞭挞剥削压迫、腐朽黑暗和愚昧落后,传播人类世代积累的精神财富和文化遗产,发现并概括历史发展的规律。这就能在很大程度上有益于帮助人们确立科学的世界观,有利于深刻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经典作家提出各种科学论断的历史背景,注意汲取足资借鉴的和务必引以为戒的历史经验,从而加深对于现实的认识,正确地从事改造社会、改造世界的实践。我们应该充分估计历史科学所具有的培育熏陶、潜移默化的巨大力量。它帮助人们增长知识、扩大视野,充实文化素养,提高精神境界,明辨是非善恶,满怀信心地去创造未来。史学工作者越是自觉地把握自己的职责所在,就越能在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建设中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对人民,对社

会作出更多的贡献。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迅猛发展,尤其是实行开放政策以来,我国的国际交往大为增加,与各国人民之间的联系日益频繁。这种客观形势表明,我国人民比之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迫切地需要了解各国,了解世界。我们要吸收外国一切先进的、于我们有用的技术和经验,同时力求避免重现别人的弊端。这都很自然地增加了人们熟悉和掌握外国历史知识的兴趣,增加了对于随时可以查阅外国历史有关问题的读物的客观需要。编辑出版《外国历史大事集》的主要目的,就是适应这种社会需要,帮助读者获得知识,为教学者增添参考资料,给涉外单位和人员提供查阅的方便。

事实上,这种工作就是贯彻执行历史科学为现实服务的方针。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我国的世界史研究只有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建设多做一些切切实实的事情,才会使人们真正感受到它的益处而日渐重视这一学科。我国的世界史学科也只有在它确实显示出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有所裨益和有所贡献的时候,才能说是已经在中国的大地上生根发芽开花结果而将获得广泛的发展。

第二,为了促进世界史学科的基础建设,开拓选题,锻炼队伍。

我国世界史学科的基础,至今仍然相当薄弱。其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1)占有史料、收藏图书严重不足,情报信息渠道不畅,缺乏系统整理加工,传输应用很不及时,多年来未曾有计划地注重资料积累,工具书极少;(2)研究课题较为陈旧,缺门太多,整体性的宏观研究未能充分开展,抱残守缺的某些积习未能清除;(3)研究成果难称丰硕,著述太少,确有较高学术价值的论著屈指可数,成果形式亦不够多样,尤其缺少简短精辟而又尖锐清新之作,不能广为传播,产生较大社会影响;(4)科研队伍既弱又小,老一辈有造诣的学者精力日见减退,中年科研教学骨干大都处于超负荷状态,实际从事科研的时间不多,青年一代不乏优秀人才,毕竟总数有限,而且后起之秀成长道路仍有崎岖,凡此种种,造成青黄不接的局面甚为严重。

以上也是世界史学界同行近几年来在各种不同场合多次大声疾呼,吁请各方面人士予以关注的。我集中起来加以综述,看起来似乎有点黯淡无光。当然,这里只说了问题的一面,几年来已在不同程度上有了若干改善。各种研究会、学会如雨后春笋,学术活动颇为频繁,学术交流相当活跃,科研成果小有丰收,其中自有佳作,世界史各种教材的编写出版更是成绩斐然。但是,我们不能不承认,上述弱点并未根本改观,看来亦非再有三年五载所能

解决。因此,我们要发展世界史学科,除了想方设法加紧培养新的人才、扩大教学科研队伍之外,还要进一步在现有人员中充分挖掘潜力,统筹兼顾,加强协作,既有通盘筹划,又能发扬各个方面的积极因素,开展多层次、多渠道、多学科、多种形式的学术活动,真正做到解放思想,百家争鸣。在这当中,组织重点课题攻关,重视学科基础建设,尤为当务之急。

在世界史学科基础建设方面,有许多工作正在或亟待进行,包括大量翻译出版外国史学名著,汇编各种专题的、地区的和断代的基本史料,编纂各类品种的辞书、工具书,等等。这都得依靠世界史同行,特别是出版部门的同心协力。编辑出版《外国历史大事集》,亦是其中的一项工作。这套10册的大事集有400个以上的选题。每篇都要把一个事件的前因后果、来龙去脉、重要过程、历史地位,用叙事形式阐述清楚,主要靠事实和材料说话,结合必要的议论和分析。因而,作者势必要占有较多的史料,需要进行一定的研究。就一个事件来说,它比教科书或通史所叙述的分量要大得多,比之专著则更为集中和浓缩。在一定意义上,每一个选题就是一项研究课题。写好一篇大事集,无疑为进一步对这个课题进行深入的研究作了铺垫。

就我们的希望而言,是想通过组织大事集的稿件,开拓一批世界史研究的新课题;即使是老的课题也能有点新意,充实些新材料,反映出国内外学术界讨论中的新见解。这样,就不仅是简单地复述事件,而是或多或少有所前进。

对于大事集的作者,我们原则上希望每个课题最好能由国内同行中最适当的人选来撰稿。所谓最适当,需要考虑到各种因素。例如某一事件,同时有几位作者都是适当人选,那就要顾及他们各自近期的工作状况和时间安排,等等。也还有这样一层意思,就是作者们要体现出老中青的组合,能够发掘锻炼一批年轻的新的的人才,向他们提供发表成果的机会。总之,既要能保证稿件的高质量,又要促进人才的成长。

第三,要把编辑出版《外国历史大事集》作为编纂我国多卷本世界通史的准备工作的一个环节,一项阶段性的成果。

在20世纪之内编纂一部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多卷本世界通史,已经确定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发展规划中的重点项目之一,也是我国世界史学界同行大多数人赞成的共同奋斗目标。现已开始着手筹备的这项任务,就我国的世界史学科来说,可谓一项宏大的计划。我个人的看法,多卷本,不一定非得几十卷。它的宏大,主要不在于其规模,而在

于它应该尝试创立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撰写世界通史的新的学术体系，能够反映世界正在面临新的技术革命的挑战这种时代的气息，注意世界各个地区、各个国家、各个民族之间横向的相互联系和相互影响，在学术上集中体现我国世界史研究的水平。因此，它需要进行多方面的准备。如果考虑到前面所说我国世界史学科基础薄弱的实际状况，更应该强调抓紧必要的先行步骤。

无论如何，我们必须以积极的态度，抓住相对来说当前这一最合适的时机，在几年之内，为实际撰写世界通史开创良好的开端，推动我国的世界史研究开创一种新的局面。

编纂世界通史的各项准备工作中有一些基础准备，《外国历史大事集》也是其中之一。所谓基础准备，是把编写世界通史所应涉及和考虑的一般性课题，先以某种成果的形式过滤一遍，便于下一步在更高的层次上确定课题。我们正在编写的《大百科全书·外国历史》卷，侧重从各分支学科和各国历史概述方面，《外国历史名人传》从人物方面，《外国历史大事集》从事件方面，提供这样的准备。它们既是各具自身独立价值的世界史工具书和基础读物，又是设计世界通史的结构、体系的最初一批草图。从准备世界通史的角度来看，这些先行步骤的意义不在于它们的稿件质量如何，而是从这些稿件中提出了什么样需要着重研究的课题，以及写作这些稿件的人选。或者也可以看作一种课题的准备、队伍的准备。

上述几个目的能否达到，设想是否正确，将要由时间作出回答。在看完《外国历史大事集》近代部分第一分册全部稿件之后，我感到有三个明显的缺点。

第一，选题范围仍然过分偏重于政治方面，有关社会经济、思想文化以及科学技术的稿件太少。这是过去世界史学科研究范围过于狭窄的反映。近几年来，许多同行批评了这个缺点，在科研实践中逐步有所克服，但在《外国历史大事集》这一册稿件中未能相应改善。

第二，约请作者有不尽恰当之处，未能充分贯彻原来的意图，多少有点照顾就近组稿的方便，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稿件的学术水平。

第三，退改稿件和统一定稿的安排前松后紧，有些作者早已交稿，编者却未及时提出修改意见，以致改稿时间短促，最后一小批稿件定稿较为粗糙，质量差些。

这些缺点，主要是我对组稿改稿的前期工作没有抓紧、对选题未作认真

推敲、退改稿件疏于检查。以后将要发稿各册，凡是来得及补救的，当设法采取一些弥补措施。在此，谨向读者致歉，并欢迎对本书提出批评意见。

我还要借此机会，向重庆出版社的同志和承印本书的重庆新华印刷厂的同志预先表示感谢。他们为了做到重点项目的科研成果早日与读者见面，将努力缩短出版周期，保证在收到各册书稿之后的六个月内出书。在我国目前的出版印刷条件下，这已经是颇不容易了。

朱庭光

1984年9月15日

目 录

英国革命中的两次内战	庄建铤(1)
克伦威尔远征爱尔兰	南纪德(16)
斯图亚特王朝复辟和“光荣革命”	王章辉 任雪芳(27)
英国工业革命	张 天 王章辉(41)
法国启蒙运动	李凤鸣(54)
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爆发	梁 平(69)
法兰西共和国的成立和吉伦特派执政	何 临(83)
雅各宾专政	尤天然 洪 波(95)
1794 年法国热月政变	端木美(108)
《拿破仑法典》的制定	李元明(116)
1812 年拿破仑远征俄国	孙祥秀(125)
法国 1830 年七月革命	冯 泉(135)
19 世纪 30 年代法国里昂工人起义	许明龙(145)
普鲁士王国的兴起	曹增寿(155)
普鲁士施泰因和哈登堡改革	肖辉英(169)
德意志关税同盟的建立	罗宜家(180)
1844 年西里西亚织工起义	郑宗育(193)
俄国斯杰潘·拉辛起义	金 捷(201)
彼得一世改革	陶惠芬(211)
北方战争(1700—1721 年)	耕 耘(222)
普加乔夫起义	徐顺娟(230)
俄国十二月党人起义	金 捷(241)
奥地利玛丽亚·特莱西娅和约瑟夫二世改革	邸 文(253)
1808—1814 年西班牙革命	刘北成(264)

希腊独立战争	王延生(275)
三次瓜分波兰	刘邦义(286)
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	徐晓光 杜平(296)
18 世纪中叶欧洲国家之间的七年战争	丁朝弼(305)
维也纳会议的召开和神圣同盟的建立	刘宗绪(314)
19 世纪初叶的空想社会主义	完珉(325)
美国独立战争	黄绍湘(338)
美国谢司起义	程华(351)
门罗主义的提出及其演变	罗凤礼(360)
美国西部的开拓	何顺果(370)
海地革命	陆国俊(382)
巴西独立运动	黄邦和(395)
西班牙南美洲殖民地的独立战争	郝名玮(408)
墨西哥独立战争	冯秀文(422)
日本大盐平八郎起义	马新民(436)
越南西山农民起义	梁志明(446)
印度尼西亚蒂博尼哥罗起义	许永璋(460)
19 世纪奥斯曼帝国的坦齐马特改革	朱克柔(471)
英国对印度的征服	林承节(484)
18 世纪中叶孟加拉的普拉西战役	曹焰(497)
非洲奴隶贸易 400 年始末	吴秉真(508)
19 世纪西方国家在非洲的探险活动	何芳川(522)
19 世纪初南非班图人的迁徙	葛公尚(533)
埃及穆罕默德·阿里的改革	杨灏城(544)
澳大利亚的发现及其沦为英国的殖民地	张天(557)

英国革命中的两次内战

庄建铤

17 世纪 40 年代的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是第一次在欧洲大国推翻封建统治，建立了资产阶级政权的革命。它的影响所及越过了一国界线而成为“欧洲范围的革命”^①，宣告了欧洲新的社会政治制度的诞生。

革命前的社会政治经济状况

英国的社会经济结构在 14—16 世纪发生了显著变化。一方面封建生产方式仍占统治地位，另一方面在封建经济结构内部资本主义关系已萌芽并获得了较大发展。

英国与欧洲大陆的商业交往，早在 11 世纪就已建立起来。12—13 世纪，尼德兰南部地区佛兰德斯的毛织业繁荣，对英国羊毛的大量需求引起英国养羊业的发展。13—14 世纪，以佛罗伦萨为代表的意大利北部城市所经营的毛织业，在竞争中超过佛兰德斯，进一步刺激了英国的羊毛贸易。13 世纪以后，英国的许多郡内出现了领主圈占公共地（牧场、荒地和山林等），建立大牧场的现象，并发生了领主重视羊毛贸易收入而用货币地租取代劳役和实物地租的变化。这就使得原来以自然经济为基础的农奴制庄园经济趋向解体。1381 年瓦尔·泰勒领导的农奴起义，沉重地打击了封建农奴制度，加速了其解体过程。至 14 世纪末，农奴制在英国被废除。在整个 15 世纪，小农经济仍占统治地位。但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由此引起的农民阶级的分化，这种状况不可能长久维持下去。一部分农民逐渐破产沦为雇工，另一部分农民即自耕农上层则租购领主土地并雇工剥削，上升为从事资本主义商品生产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第 321 页。

的租地农场主。

在封建主阶级内部，也出现了分化。大贵族为维持自身地位不得不将一部分土地租赁出去，但仍难挽回衰落的趋势。中小贵族则积极适应羊毛出口贸易和国内农产品市场迅速发展的局面，大力兴办资本主义性质的农牧场，以求获得十分可观的利润。这个资产阶级化的贵族阶层，又被称为“新贵族”。15 世纪末和 16 世纪初，在商品经济较发达的东南部地区发生的大规模圈地运动，就是在农业经营的变化和农村阶级分化基础上出现的。其主要参加者和受益者即是新贵族和一部分自耕农上层。

圈地运动大大加速了原缓慢进行的直接生产者农民与土地分离的过程，为资本主义的工场手工业和同样以雇佣劳动为基础的农场经营提供了充分的“自由”劳动力，并扩大了国内商品市场。这种对农民土地的彻底剥夺，不仅奠定了英国资本原始积累的基础，而且使英国农村经济发生了由封建土地所有制向资本主义土地所有制的转化。16 世纪上半叶，由于亨利八世在宗教改革中没收和拍卖大片教会地产，以及“价格革命”引起的粮食和农产品价格迅速上涨，使得圈地运动的规模更加扩大。不仅村社的公有地被圈占，农民的份地也受到侵夺。大批破产农民，除无生计的流浪者外，或是流入城市受雇于手工工场，或是在故地的大农场中充当农业雇佣工人，或是作为家庭手工业者为呢绒商加工产品。他们的地位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直接置身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当中。农村社会的这种剧烈变革，资本主义在农村的深入发展，是英国在 16 世纪完全不同于欧洲其他国家的一个历史特点，它显示出英国资本主义发展的优越性和巨大潜力。

16 世纪英国的资本主义工商业也在 15 世纪工场手工业和出口贸易初创局面的基础上获得了长足的发展。新航路开通后，英国位于大西洋贸易的枢纽位置，商业扩张为工业品开辟了广阔的海外市场，殖民掠夺又为工业发展提供了必需的巨额资本。都铎王朝，尤其是伊丽莎白女王执政时期（1558—1603 年）所实行的保护和支持工商业的政策，亦使英国在同欧洲他国的商业竞争中处于有利地位，从而使民族工业得以勃兴。最重要的是，工业生产得到了圈地运动后造成的大量廉价劳动力和国内市场，以及农业变革后迅速充实的粮食和生产原料的供应。16 世纪下半叶，英国已从一个羊毛原料输出国变成呢绒等工业产品的输出国。至 17 世纪上半叶呢绒的出口量较 16 世纪中叶增长了两倍多。与此同时，采矿、造船、冶金、金属制造、玻璃、造纸等新兴工业部门，因广泛采用雇佣劳动的手工工场形式，而极大地提高了生

产水平和销售规模。其中煤的年产量，至17世纪初时已居于欧洲之首。一系列由王室颁布特许状的海外贸易公司，也在伊丽莎白女王执政时期纷纷建立起来。1588年英国在对西班牙海战中击败“无敌舰队”取得胜利，又使其确立了海上霸主的优势地位。英国商人从此奔走于从波斯到北美，从北欧到印度洋的广阔世界，这既是英国王室重商主义政策成功的反映，又是英国工商业资产阶级成长壮大的明显标志。

随着16世纪末17世纪初封建君主专制统治的加强，资本主义关系与封建制度的矛盾变得越发尖锐，阶级关系和阶级力量对比发生了显著的变化。

依附君主专制的封建贵族世家在1455—1485年的“玫瑰战争”中自相残杀，元气大伤；在圈地运动中又置身于外，在旧有领地内依然用传统方式剥削农民。在商品经济日益发展和“价格革命”的不断冲击下，这些仍以收取固定地租过活的爵爷们经常入不敷出、负债累累，只好出租或典卖土地，经济地位不断下降。在政治上，他们担任政府高官，取得王室补助，在一切政治冲突中依国王意志行事。站在封建势力一边的还有在宗教改革后从国王那里获取了不少既得利益的国教会高级主教，他们利用国教会和主教权力，协助国王压抑资产阶级和新贵族的改革教会的任何要求，利用他们在议会上院的席位与贵族一道，反对任何改革提案以维护国王专制。

在工商业资产阶级当中，最有势力的是从政府领取特许状组织国家贸易公司的大商人和商业高利贷者。17世纪初，国家的大宗商品专卖权为最多不过200人所掌握，他们主要集中在伦敦。全国货币流通量的1/4也汇集于这个工商金融中心。这些人只占资产阶级的极少数，他们希望国王提高他们的政治地位，却反对激烈的变革。广大工商业资产者要求国王废除商品专卖权，实现贸易自由政策，反对国家干涉圈地，反对继续保持工业生产中的封建行会制度。工商业资产阶级还迫切要求废除封建贵族特权，尊重和保护他们的利益和要求，放弃专制政策，尊重议会权力等。在这方面，他们找到了最好的同盟者——新贵族阶级。

在16世纪迅速成长起来、由乡绅构成的新贵族阶级，在革命前已经成为英国政治舞台上的一支重要力量。与工商业资产者不同，新贵族享有与旧贵族同样的政治特权和地位。他们掌握地方的实权，拥有议会下院的多数议席，并有较大的社会影响。由于新贵族在经济活动中与工商业资产阶级联系紧密，利益相通，他们所面临的进一步发展的障碍性因素和社会改革要求也趋向一致。这样，新贵族往往是资产阶级在议会中的政治代言人。除了同资

产阶级共同关心的问题外，新贵族亦有自己的独立要求。这主要表现在：新贵族的土地所有权虽不断扩大，经营方式也已资产阶级化，但在法律上却依然受到国王的限制，必须缴纳“骑士捐”。新贵族急于通过社会变革取消束缚其发展的骑士领有制，而要达到这个目的就必须与资产阶级携手。

革命前，农民问题也变得异常尖锐。农民在17世纪上半叶仍占英国居民的大多数，可分为自耕农和茅舍农两大部分。自耕农又由自由农和公簿持有农两部分组成。自由农是中世纪农奴化过程中始终保持自由人身份的农民，自己拥有土地可世代相传和自由支配，在经济上比较独立，担负领主的封建义务比较轻。这部分人在15世纪的小农分化和其后大规模的圈地运动过程中地位多数上升，不少人直接参加圈地，并开办雇工剥削的农牧场。他们是自耕农上层，人数较少。公簿持有农则占自耕农和整个英国农民总数的多数，是在农奴制废除以后才获得自由身份的。这些根据庄园法庭的公簿租用土地的农民，租地份额很小，却要担负许多封建义务。他们深受封建制度的压迫，有较强的革命倾向。茅舍农的生活境况则更加贫寒，他们只能使用所住茅舍周围的少量土地，主要靠农村的公有地过活。茅舍农和公簿持有农虽在圈地运动中深受其害，对资产阶级和新贵族的残酷掠夺表示反抗，但由于他们受到封建制度长期的压迫，对之深恶痛绝，所以当资产阶级革命爆发后，他们能站在反对国王统治的阵线一边，在革命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社会阶级关系和各种政治力量的配置趋于明确的同时，17世纪上半叶革命的舆论准备工作也在积极进行，这就是清教运动的发展。从16世纪下半叶开始，资产阶级和新贵族接过了喀尔文教的思想旗帜，创立和发展了清教教义。他们主张纯洁教会，清除英国国教会中的天主教影响，提倡勤俭节约，反对奢华纵欲。他们反对国王专权教会事务的君主制教会体制，主张建立一个反传统封建教阶制的民主教会组织。这反映了资产阶级在资本原始积累时期的道德标准，以及通过教会改革推动政治变革的愿望。16世纪80年代，清教运动曾取得很大进展，两个主要派别“长老会派”和“独立派”已形成。长老会派代表大资产阶级和新贵族上层的利益，提出以长老评务全国会议取代主教制政府，要求王权不干涉教权，这实际上是谋求政治统治权力。他们力求通过与国王妥协达到目的，极端惧怕激进的革命运动。独立派大多是中小资产阶级和新贵族的代表，他们要求各个教会独立自主享有民主权利，既反对主教制，也反对长老制这类中央集权的教会形式，实际上反映了这些阶级求得经济上自由竞争和政治上民主共和的迫切愿望。17世纪上半